



周云之文集

ZHOU YUNZHI COLLECTED WORKS

周云之 编著



上海夏林出版社

周云之文集

ZHOU YUNZHI COLLECTED WORKS

ZHOUYUNZHI | 编
周云之 |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 CIP 数据

周云之文集 / 周云之 著, 华夏翰林出版社, 2005.8

ISBN962-486-126-9

I. 周… II. 周… III. ①逻辑学—论文集—中国—当代 ②书评—论文集—中国 IV. J.069

华翰版数据核字(2005)第 00106 号

书 名: 周云之文集 著者: 周云之

出版者: 华夏翰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 雨 路

[出版社驻京信址: (101100)北京市 238 信箱 电话: 010-89501066]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 印数: 0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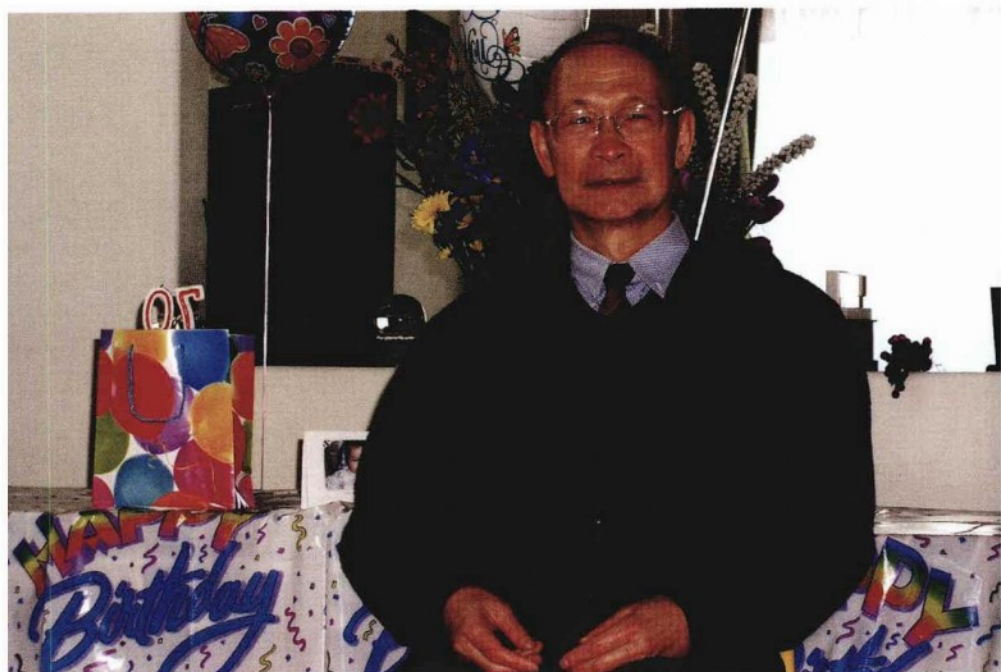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凯兹印刷厂

国际标准书号: ISBN962-486-126-9

定 价: 46.00 元

 华翰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周云之 2004 年 2 月 24 日 (70 岁生日) 摄于美国家中



周云之 2003 年与夫人合影于美国加州州府



周云之 2004 年与夫人、大女儿合影于美国家中



周云之 2001 年与夫人、小女儿合影于北京家中

喜色滿園不任一枝紅杏
出牆來 送康中近辛首書奉

云之先生以頌新聲

中石

这是20世纪80年代
我国著名书法家欧
阳中石先生赠给作
者的条幅，今复印
在此，永作留念。

简 历

周云之,男,江苏宜兴人,1934年2月24日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担任潘梓年(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的科研秘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过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理事长、墨经研究会副理事长、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主要从事哲学、逻辑学特别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形式逻辑原理》(合著)、《先秦逻辑史》合著、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副主编)、《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副主编)、《中国逻辑史》(主编)及个人学术专著《先秦名辩逻辑指要》、《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墨经逻辑学》、《名辩学论》等。发表过学术论文、书评等50余篇。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哲学大辞典·逻辑学卷》、《孔子大辞典》、《逻辑百科辞典》、《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卷》等辞书的编写工作。

体例说明

一、这本论文集除了新写的《我的学术生涯(代自序)》一文外,都是我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孔子研究》、《光明日报》、《江西社会科学》、广东《学术研究》、武汉《江汉论坛》以及《南开学报》、《四川大学学报》、《辽宁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学术论文、书评和纪念文章共 52 篇(不包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在通俗读物上或以笔名发表过的简介、短文等)。《文集》共分为形式逻辑论文、中国逻辑史论文、书评和纪念文章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论文又都是按发表时间的先后编排的。

二、在目录上凡论文题目前加有“○”标志的,是作者认为比较重要或论证比较详细或更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仅供参考。

三、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曾应邀给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撰写了一篇约一万余字的题为《中国古代名辩逻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及它的重要特点和巨大贡献》的论文。但交稿不久,前苏联就解体了。直到 1993 年 5 月,此文才被收入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唯物论的传统与当代现实》一书中。

因为该文是被翻译成俄文出版的,全文共 25 页(俄文),而我的原文(中文)底稿一时又找不到,所以没有被收录在我的《文集》中。

四、每篇论文发表的报刊名称及年代、日期或期号都印在每篇论文之后,以便读者查找。

五、因为这是一本论文集,所以《文集》中没有收入已经公开发表的著作及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学术资料。为便于读者查考,我在《文集》的最后又收录了我已经出版过的著作目录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资料目录等。

六、因为我六月下旬因故急于要去美国,故这本论文集交稿相当仓促,交稿前没有时间进行审校。虽然出版社将清样寄来了美国,我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校审,但因底稿不在身边,故差错还是很难避免。不明之处,请查阅原文,特表歉意。

周云之

2005 年 9 月底于美国加州



我的学术生涯(代自序)

●周云之

一

我于1934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二日)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县)丁蜀镇乌溪村。因日寇侵犯曾多处逃亡,最后在丁蜀镇上租房定居。我就在丁蜀镇的丁山小学读完了小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考入了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初中部),1949年解放后我又升入了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即今江苏省苏州中学)就读高中。

1950年底的寒假期间,我被学校的团组织派到当时设在东吴大学的苏州市青年干部学习班学习。就在学习班快要结束时,团市委就动员我们积极参加苏州市的市政建设工作。就这样,我一个还不到17岁的高中二年级学

生,就在1951年1月在没有和家中父兄商量的情况下正式参加了市政工作。开始被分配到苏州市税务局平门税务所(后被合并为北区税务分局),从事税务稽查的外勤工作,整天要稽查私营商界的各种偷税、漏税、编造假账等违法行为。“三五反”运动后,我就被调到市税务局人事科,具体负责人事档案的保管、整理工作。

1952年冬,我又被调到苏州市总工会所属的苏州市财政金融工会(产业工会)工作,担任专职的产业工会常委。当时的苏州市财政金融工会分管着苏州市的税务局、财政局、人民银行、保险公司、典当业等六七个财政金融单位的基层工会。解放初期,各单位的基层工会尤其是涉及政府、银行等单位的基层工会还刚刚建立,如何处理好工会和行政、工会和党团组织的关系以及作为政府、金融单位的工会如何开展工作等都是一个极待研究、探索和解决的棘手问题。我作为苏州市财政金融工会唯一的一名(开始还有两位专职干部,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专职常委,经常要到基层工会熟悉、了解各种情况,要和基层单位的党、政、团等机构的领导协商,研究基层工会如何开展工作和如何发挥作用等等有关问题,还要面对基层工会中专职干部之间、专职干部与非专职干部之间的各种矛盾。我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经验很少,年龄也刚过18岁的青年,要独立面对和解决这一大堆新矛盾、新问题,难度是可以想象的。但不论工作的成果如何,在这三年多的工会工作实践中,极大地培养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提高了我分析问题和解决矛盾的能力。记得在1954年春夏之交,有一次我们苏州市财政金融工会和苏州市商业工会合办了一个运动会,我担任了筹委会的秘书长,全面、具体地负责运动会的相当复杂的筹备、组织工作。在运动会开幕那天,更要忙着面对和解决运动场上的各种具体问题。因为我年龄太轻,有个别单位或个别人总是不太接受我的意见和指挥,我只好到主席台上直接向负责财

经工作的一位副市长汇报,这位副市长坚决支持我的工作。告诉我,谁不服从指挥就把这个单位的经理(商业公司)或领导找到主席台上来。就这样,我终于完成了这次运动会的全面组织工作。1954年的12月25日,在我20岁时幸运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表面上看,这五年多的工作实践跟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我之所以要简述这五年多的工作情况,正是要说明这五年多的工作实践不仅培养了我的独立工作能力,增加了我实际工作的经验,而且对我后来的哲学学习和学术研究都是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的。正是这五年多的工作实践,使我初步学会和提高了面对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能力和經驗,这恰恰是一个人学好哲学理论的重要条件,而且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也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

二

1956年9月,正是我中学同学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有幸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说实在话,在我进入哲学系学习之前,我对哲学这门学科几乎是无知的。我之所以报考哲学系,并不是出于我对哲学的了解或爱好,而是因为我的数、理、化基础太差,无法报考理工科,再就是从学科介绍中抽象地知道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因此我相信哲学一定是很重要、很神秘的一门学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后,我开始感觉到学哲学跟实际生活的关系尤为密切,跟我过去的工作实践也很融洽,学哲学的兴趣就越来越大。

意外的是,到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突然感到说话越来越困难,几乎发不出音来,经诊断是严重的慢性上呼吸道感染。一时心情感到很沉重和苦恼,我不得不化很多时间不断地到城里各大

医院求治,但见效甚微。系里为了照顾我说话困难的心情,帮助我在学生宿舍区专门找了一个小房间(工具房)或在校医院找了一间小病房,让我一面坚持听课一面专心养病。有时我也参加同学们的专题讨论会(上课时间),我偶尔也把自己的观点即席写出来请同学代为宣读。在我有病期间,我们班上的同学对我都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我,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有的还专门帮我装了一个有线广播,就这样边学习、边治病,坚持读完了二年级的课程。

在即将升入三年级学习时,系里要组织全系学生到农村参加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系里要求我休学一年回老家好好养病、治病。我接受了系里的建议,于1958年夏天回到我的老家——江苏宜兴丁蜀镇,开始了我专门治病、养病的生涯。我开始请镇上的一位老中医诊治,他说我身体太虚,需要补气补血,给我开了包括人参在内的中草药,可吃了一段时间后病情并无变化,反而越吃越虚。我又转请另一位老中医诊治,他说我内火太大,不能再补,而要泻火,让我吃了一段时间泻火的中药,病情还是无变化,身体自然就越泻越虚,只好再请前一位中医诊治。就这样一补一泻反复了几次,不仅于病无益,身体更觉虚弱。在无奈之下,我决定不再吃药,开始自己养病。我渐渐增加室外的活动,每天从走半小时左右,逐步增加到快走二小时左右,我发觉自己的心情反而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健康。就这样,我带着原来的病症和开始恢复的身体渡过了一年的休学生活。

1959年夏天,我终于心急如焚地回到北京大学,开始我大学三年级的学习生活。我决定走边学习边治病的道路,但我的治病已不再是上医院、吃中药的道路,而是努力运用我学习的哲学知识,面对自己说话困难的实际,走积极锻炼、乐观养病的道路。我开始正式参加慢跑的运动,起初是每天在校园内少量的慢跑,并做些其它力所能及的活动,后来逐步增加运动量,最后我都能从

北大南校门跑到颐和园东门再折回,大约有7000米左右,自己感觉真的像个慢跑运动员了。一到星期天,为了避免在同学面前因说话困难给我带来的精神负担,我经常独自一人或是从北大走到香山再走回,或者从北大一直走到天安门,来回一趟约有40多公里,多少次足上走出了血泡,但心情是快乐的。因为走到大自然中去,走到社会生活中去,既锻炼了身体又开阔了心境,不会有孤独和病痛之感。随着身体健康状况的不断增强,我在养病、治病方面也更加积极起来。我不断地联系自己的病情实际和过去治病的经验教训,经常分析学习和治病、治病与锻炼的辩证关系,分析自己治病中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分析治病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等等的辩证关系,我决心用持久战的战略精神来打一场战胜疾病的持久战。

在坚持身体锻炼的同时,我又在校园内找一个没有人去的小房间,开始小心翼翼地试着练习发音,由发一个音到逐步发一句话,由很低声逐步到普通声。我越来越感到,随着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我的上呼吸道炎症已经越来越稳定和消退。过去那种越是发音困难越是害怕说话的态度是过于消极的,应该在病情基本稳定或好转的情况下,采取稳步而积极的态度逐步练习和恢复发音。经过二个多学期的练习,我终于逐步恢复了正常的交往生活。当然,说话的时间稍长或发音较大还是会有不良感觉的,所以我一直采取谨慎态度,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或少说,原则上不大声说话或唱歌。就这样到大学四年级,我基本上依靠自己的身体锻炼和发音练习逐步战胜了疾病带来的身体虚弱和说话困难,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和朋友交往。从四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我又接受了一些社会工作,不仅被系党总支聘任为总支的组织干事,经常到教员及学生党支部了解发展党员的情况和进度。我还担任了班上的哲学原理(经典著作研读)课代表,经常要跟授课老师联系或商讨讲课的有关事项,这也更加促进了我的学习积

极性。

从表面上看,我的大学生活似乎化去了主要或大部分时间来治病、养病并和疾病作斗争,但实际上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耽误听课,而且一直是非常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跟疾病作斗争的。不仅取得了身体的健康和基本上战胜了疾病,而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所学的哲学理论。所以五年(不包括休学一年)的大学学习生活中,我除外语(俄语)只得一个“良”,其它的各门哲学课程都是“优”。(那时实行的不是百分制,而是优、良、及格、不及格的等分制。)我的毕业论文也被指导老师评为“优”。大学五年不仅使我初步学懂和掌握了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工具,而且使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为我今后从事哲学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五年的大学生活虽然不是我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但它确实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准备阶段,是我整个学术生涯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

1962年10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担任潘梓年(当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的秘书,那时潘梓年已退居二线,不再具体负责行政方面的事务,为的是要在晚年专心从事研究,把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写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逻辑学》两本学术专著。所以潘梓年约我见面的第一天就明确告诉我,今后行政方面的事不要去过问,除必要的机要工作外,主要是帮助他完成这两本书的写作任务。平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帮助他收集、整理资料,并做了大量卡片。这些工作看起来非常简单、琐碎,但每张卡片都要作出简明的分析和哲学归类,实际上也都是一个学习哲学和运用哲学的过程。

那时候潘梓还偶尔被邀请出去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其中给我影响较深的一次是,在我刚来哲学研究所不久,潘梓年就被中国科学院院部邀请去给全院的(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生讲哲学专题,我也被请在台上坐着,潘梓年在讲课过程中,不时地问我某种观点是引自马、恩、列、斯的那一篇著作,我实在是难以回答。课后中科院竺可桢副院长宴请潘老时,我也陪同。记得竺可桢副院长对我说,潘老是大家尊敬的老革命和老专家,你在潘老身边当助手,一定能学到许多东西的。我知道竺老是在鼓励我,也是在鞭策我。自此以后,我对潘老更增加了一份敬意,也深感自己要作好潘老的助手应该是学无止境的。那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一是要好好补学、多学一点哲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和经典著作;二是要好好了解、熟悉和学习潘梓年过去和后来在哲学与逻辑学方面的基本思想和合理观点。遗憾的是,在我担任潘梓年科研秘书的三年多时间里,我虽然作出了近千张资料卡片,但我曾两次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至少花去了一年多时间,不久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潘梓年刚刚想要动手写的两本著作,不仅没有能真正开始,从此也就彻底的坠入海底和烟消云散了。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也没有写过一篇属于自己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自然作为我自己的学术生涯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开始,至多也只能算是大学学习生涯的继续和真正学术生涯的准备而矣。但是潘梓年过去的革命生涯和学术道路对我还是有很多启示的。我不仅敬重潘梓年的革命人生,也敬重潘梓年在哲学研究上的敬业精神和治学方法。正是因为我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对潘梓年的革命人生和学术生涯有过初步的了解,才使我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可能应邀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深度写出了八九篇有关潘梓年的传略和纪念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不仅记录了潘梓年革命的一生,也深入地分析和概括了潘梓年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成果。在我所写的这些传记或纪念

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有：最初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家的《潘梓年传略》一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后被列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的《潘梓年》一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和最后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的《潘梓年》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就这样，潘梓年不断被社会追认为“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名家”到“学术大师”。1993年1月在纪念潘梓年诞生100周年所召开“潘梓年学术思想讨论会”时，我又在《哲学研究》1992年12期上发表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鞠躬尽瘁》一文，还在《哲学动态》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析潘梓年在逻辑学研究中的得和失》一文，全面地概括了潘梓年在哲学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在逻辑学研究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局限性失误。虽然这些传略或文章都写成并发表于潘梓年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但潘梓年对我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治学方法等方面的影响却主要是在我担任潘梓年秘书的三年多时间里。这也反映了我在担任潘梓年秘书的三年多时间里为自己真正开始的学术生涯又一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到1975年初，我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总算基本结束了，接着就提出要逐步恢复学术研究和一切业务工作。因为我原来担任潘梓年的科研秘书，虽然办公在学部机关，编制却在哲学研究所，但并未具体确定在那一个研究室（组）。由于在文化革命后期，我一直被编在西方哲学史和逻辑学合并的政治学习小组（当时简称为“西逻辑”），我当机立断表示愿意留在逻辑研究室